



社会学丛书

西方社会运动发生机制研究

张孝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学丛书

西方社会运动发生机制研究

张孝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社会运动发生机制研究 / 张孝廷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6

ISBN 978-7-5161-6317-7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社会运动—发生机制—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C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109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凤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64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斗争史。最为激烈而壮观的莫过于革命，但是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却是极少数的现象，人类社会的抗争更多表现为“弱者的抵抗”。革命所付出代价是巨大的且成功的概率较低，而“弱者的抵抗”只是一种消极的抗争，收效甚微。抗争如何以较小的风险获得较大的受益，促发了抗争主体不断创新抗争形式，社会运动这一新的抗争形式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并成为集体抗争的集合令，位于抗争家族谱系的中心位置。它具有一些与革命和弱者抵抗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社会运动是持续而公开的斗争政治，具体表现为制度外的集体挑战，具有组织化的共同目标和远景以及常备的表演剧目。另外，社会运动是WUNC展示的运动，它具有一定的价值追求（Worthness）、行动统一（Unity）、规模的人数（Numbers）和积极主动的奉献精神（Commitment）。

社会运动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伴生物，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延续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政治诉求和参与的表达方式，追求各项权益和政治道德理想的抗争手段。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在局部情况下，具有暴力性和破坏性），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正是社会运动的抗争剧目及其剧情表演所产生的功效，不同的国家纷纷效仿，各种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不断爆发，使得西方社会成为“社会运动的社会”。

西方学者对社会运动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形成了诸多的理论研究成果，包括群体与社会心理学、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框架建构理论以及它们更多的分支。但是概括起来，这些理论大体可以分为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流派，形成不同观察社会运动发生的

视角和观点，各有优劣，但是彼此之间却常常处于忽略状态。这种分割性的研究方式，一方面使得对社会运动某些方面的研究得以深入，另一方面却不能完整说明社会运动发生的复杂性。于是西方的一些学者，如查尔斯·蒂利、道格·麦克亚当和西德尼·塔罗等人，开始尝试着超越流派间藩篱，从机制入手探求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沿袭“事件——过程——机制”的论述模式，这样的论述使得社会运动的研究落入一个个具体运动的泥潭之中，同时也使得论述复杂化，更难以发现机制在社会运动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如有人对关于社会运动发生的机制进行统计，居然达到 44 种之多，而且还没有分析机制之间存在的相互抵触和消解的可能性。

论著作者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将社会运动研究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立足于社会运动抗争者、抗争诉求对象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三重维度，把社会运动发生机制的研究放在“变迁——冲突——互动”的框架之中，以便清晰呈现社会运动发生的机制。

作者运用文献法、案例法和比较法对西方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展开研究，整合前人不同的理论研究成果，从静态和动态、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分析西方社会运动发生的社会机制、政治机制、组织机制以及对抗双方的互动机制，这些机制既包括促进机制，也包括阻碍机制。

作者在论著中首先分析对社会运动对抗双方产生影响的社会环境机制，具体包括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技术化的工业主义、阶级化的社会结构和激进化的启蒙运动，社会运动双方都要对此作出反应和回应。此外，社会运动必然受到国家形成、转型、崩溃以及国家性质的影响，同时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和封闭、机遇和威胁以及国家权力机器对社会运动的治理能力和处理手法也深深地影响着社会运动的发生。不可否认，社会运动的发生还受其自身组织机制的影响，组织机制包括社会运动领导的团结和分裂，现有组织的利用、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员，一方面要解决搭便车和机会主义问题，另一方面要做到广泛的资源动员、社会利用、居间联络和认同框架建构等；在新媒介时代，必须合理利用媒体的力量，通过媒体镜像展示和动员社会运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社会运动毕竟是对抗双方互动的社会现象，社会运动的类型不同，招致的回应也就不同。在这互动过程中，作者重点论述了三类互动机制：合法性的确立和撤销、认同感的建构和解构、边界的激活和钝化，他们从或积极或消极方面影响社会运

动。在互动过程中，社会运动斗争手法的调整和创新，也对社会运动的兴起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暴力破坏性的斗争手法之外，社会运动创新了请愿、游行示威、罢工和静坐等斗争手法，极大地缓和了斗争双方对抗的剧烈性，有利于社会运动的生存和发展。在斗争过程中，斗争周期的转化意味着社会运动的兴起、衰弱或者消失的过程。

这篇论著的创新之处，在于对社会运动各自分化而互不联系的研究理论进行整合，从机制入手对社会运动展开研究，既分析了促进社会运动的机制，也分析了弱化或消解社会运动的机制，它们之间的交织演化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未来走向产生很大的影响。作者认为，不同机制的排列组合，将使不同国家社会运动的发生产生很大的差异。立足于此，作者对社会运动的未来前景持谨慎的态度，认为社会运动的未来，既有可能扩散，也有可能消解；既有可能在外部或内部促进民主化，也有可能去民主化；社会运动的抗争既有可能温和化，也有可能激进化。这一切都取决于著作里所分析的不同机制的促进和阻碍的二重性，取决于诸种机制的排列组合。

作者虽然分析的是西方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不过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的我国来说，跟踪研究社会运动的历史现象和当代形式，梳理社会运动的演化路径，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使我国国家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张孝廷
2015年3月于杭州师范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研究意义与问题的提出	(1)
(一) 为什么是西方	(1)
(二) 社会运动的社会	(3)
二 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前沿	(4)
(一) 社会运动中的理性主义	(4)
(二) 社会运动中的结构主义	(9)
(三) 社会运动中的文化主义	(16)
三 研究方法及其内容安排	(30)
(一) 走向综合式研究	(30)
(二) 基于机制的研究	(35)
(三) 研究的内容	(39)
第二章 理解社会运动	(42)
一 家族相似性：从革命、集体行为到社会运动	(43)
(一) 聚焦革命	(43)
(二) 骚乱与集体行为的转向	(47)
(三) 走向社会运动	(51)
二 何谓社会运动	(56)
(一) 制度外的集体挑战	(56)
(二) 组织化的共同目标和愿景	(57)
(三) 常规性表演剧目与 WUNC 的展示	(58)
(四) 持续而公开的斗争政治	(59)
三 为什么是社会运动	(61)
(一) 集体抗争的集合令	(61)
(二) 家族谱系的中心位置	(62)

(三) 中国关怀	(62)
第三章 社会运动发生的社会机制	(64)
一 市场化的资本主义	(66)
二 技术化的工业主义	(73)
三 阶级化的社会结构	(77)
四 激进化的启蒙运动	(81)
五 总结	(86)
第四章 社会运动发生的政治机制	(91)
一 情境性机制的深化和转化	(91)
(一) 斯梅尔塞加值理论	(92)
(二) 加值理论的局限	(94)
二 社会运动发生的国家面向	(97)
(一) 国家形成与社会运动的兴起	(98)
(二) 国家转型或崩溃与社会运动	(102)
(三) 国家性质与社会运动	(105)
三 政治机会结构	(109)
(一) 政治结构的开放与封闭、机遇与威胁	(110)
(二) 政体成员与社会运动	(113)
(三) 政治机会结构影响社会运动的综合模型	(116)
四 抗议处理	(119)
(一) 抗争警治	(119)
(二) 处理手法	(123)
五 总结	(129)
第五章 社会运动发生的组织机制	(131)
一 社会运动的领导者	(131)
(一) 运动组织中领导者的功效	(131)
(二) 领导者的团结和分裂	(136)
二 运动中的组织	(148)
(一) 组织对于社会运动：灭火剂还是催化剂	(149)
(二) 组织对于社会运动的消解与促进：综合的视角	(152)
三 组织社会运动	(155)
(一) 奥尔森难题的破解	(156)

(二) 运动中的组织动员	(159)
四 媒介适用：媒介革命和内容选择性渲染	(175)
(一) 媒介革命	(175)
(二) 内容的选择性渲染	(178)
五 总结	(180)
第六章 社会运动发生的互动机制	(182)
一 运动类型及招致的回应	(182)
二 抗争互动	(189)
(一) 合法性确认与撤销	(189)
(二) 认同建构与解构	(193)
(三) 边界的激活与钝化	(197)
三 抗争手法	(201)
(一) 暴力破坏性的抗争手法	(202)
(二) 常规性的抗争手法	(204)
(三) 走向综合运用的抗争手法	(208)
四 抗争周期	(210)
(一) 运动内周期	(210)
(二) 运动间周期	(212)
(三) 运动周期中的政府、组织和个人	(214)
五 总结	(218)
第七章 展望社会运动	(221)
一 社会运动产生的动力	(222)
二 社会运动的未来	(225)
(一) 社会运动的扩散和遗散	(226)
(二) 社会运动的民主化和去民主化	(228)
(三) 社会运动的温和化和激进化	(229)
参考文献	(232)
后记	(248)

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意义与问题的提出

西方社会运动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伴生物，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延续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追求各项权益和政治道德理想的抗争手段。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在局部情况下，具有暴力性和破坏性），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来说，跟踪研究社会运动的历史现象和当代形式，梳理社会运动的演化路径，促使国家和社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为什么是西方

“西方”，在国内学术界，似乎是一个隐含的不言自明的概念。它可能包含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地域上的，即指英美和西欧等国家；二是政治上的，即指与社会主义相对应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可能潜意识里将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统称为“西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即指英美和西欧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西方，资本主义最先得以发育和发展，打破了传统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走上了与传统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从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以及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等著作中发现这些国家社会变化的剧烈性。这种转型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冲突和对抗，各种骚乱、政变和运动时有发生，甚至出现重大的革命，从不同的方面塑造着抗争的具体形态。社会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发源于这些国家，并不断向西方之外蔓延，为西方之外的国家提供了可效仿的抗争形式。

另外，西方也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生地，“人为自然立法”、“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响彻世界的变奏曲，激励一代代人为之而奋起献身，也从另一个方面塑造了“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成为激励西方公民不断抗争的信念框架。这种不服从的信念激励着西方社会的抗争运动从单纯的利益之争走向多元的权利和身份之争，社会运动也从被动型驱动的抗争转向主动型驱动的抗争，使得社会运动的家族谱系日益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运动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也使得公民运动从全国向全球层面不断扩展。从社会运动的起源地开始这样的研究，有利于更为清晰地展示社会运动发生的基础条件和剧情表演的变化路径，也可以从这些国家治理社会运动的实践中收获更多的经验性启示。但是当社会运动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可能也会偶尔离开西方这个区域，而走向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去探讨社会运动的发生情况，它们的发生一方面是对西方社会运动效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西方国家参与和干涉的结果。这种偏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探寻社会运动发生机制的多元性，不同情境下社会运动发生的机制组合的差异性，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运动发生的复杂性，从而对处于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更多的启发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期，同时也进入了矛盾的凸显期，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公安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 年到 2003 年 10 年内，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年平均增长率为 17%，由 1994 年的 1 万起增加到 2003 年的 6 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 73 万人次增加到约 307 万人次。^① 2005 年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达到 8.76 万起，平均每天达 240 起之多，比 2004 年增加 6.6%；2006 年开始以后每年的群体性事件都超过了 9 万起。^② 到 2011 年，甚至平均每天发生 500 多起群体性事件。^③ 通过对西方社会运动发生及其治理的方法展开研究，从一定意义上，对我国治理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可能能提供反思性借鉴模式。

^① 冯书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弱势群体》，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5/14142/1260355.html>）。

^② 杨敏：《群体性事件之政府答卷》，《决策》2009 年第 1 期。

^③ 《2011 年，中国平均每天发生 500 起群体性事件，这意味着什么？》（<http://tieba.baidu.com/f?kz=1405744371>）。

(二) 社会运动的社会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运动，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社会运动出现在 18 世纪晚期，形成于 19 世纪^①，因其组织化、规模化以及抗争手法的典型化而独树一帜，成为当前公民抗争的主流形式之一。随着两个多世纪的变迁演化，社会运动以其独特的生命力为公民追求利益权利、民族独立和社会正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对立的一方所利用，组成了逆向社会运动。当社会运动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从暴力性走向温和化，从破坏性走向建设性，从零散性走向组织化的时候，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公民抗争以实现诉求的重要手段，使当今西方社会成为社会运动的社会。

戴维·迈耶和西德尼·塔罗认为西方是“走向社会运动的社会”，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运动由以前的偶发现象变成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频发现象；二是和以前相比，抗争行为被各种各样的机构所使用以呈现非常广泛的行为诉求；三是职业化和组织化正将社会运动抗争诉求的主要工具变成常规政治的一种工具。^②

和以前相比，社会运动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也可以从一些研究者的实证调查的数据中看出。鲁赛尔·道尔顿在对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调查中发现，每个国家非常普遍的政治活动，在 20 世纪后后 25 年后期比前期（1974—1990）更为常见。抗争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非常普遍的政治活动，如被调查的英国人签名请愿的比例从 1975 年的 22% 上升到 1990 年的 75%，参与示威的德国人从 1974 年的 9% 上升到 1990 年的 25%。^③ 在时间层面上，社会运动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且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运动发展也不是均等的。西德尼·塔罗认为存在一个斗争周期现象，社会运动可能会呈现一个波浪形的发展态势，甚至会出现向革命演化的迹象。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家汉斯彼得·克里西和库普曼斯在对欧洲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士的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发现有个运动浪潮现象，德国、荷兰、瑞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有

①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 年版，第 7—8 页。

② David S. Meyer, Sidney Tarrow,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 Inc., 1998, p. 4.

③ Dalton, Russell, *Citizen Politics: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2d 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96, pp. 75—76.

个突然的运动浪潮出现，而法国却基本保持平稳。^①

这给许多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提出了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什么因素促使社会运动呈现一种普遍发展的、常态化的趋势；为什么在一定时段内社会运动呈现周期性波动现象；哪些因素使社会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呈现许多相同和不同的发展局势；社会运动就其形成来说，蕴含着什么样的发生机理；社会运动的发展给民族国家带来哪些影响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 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前沿

社会运动的研究可以说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作为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随之形成了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诸多理论。具体包括群体心理理论、社会心理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框架符号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解读或解释了社会运动问题，但是它们之间相互冲突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归纳起来，这些理论主要从理性、结构和文化三个角度进行社会运动的发生学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可以说是社会运动研究最蔚为大观的时代。将社会运动研究推向顶峰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发展，即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理性视角和结构视角被引入到社会运动研究中来，它们在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的传统研究基础上，补充阐明社会运动如何发生的问题，使得社会运动在宏观和微观、个体和集体之间对行动的作用实现了一个有趣的联结，也使得社会运动研究得以向纵深演化。20世纪80年代，以戴维·斯诺和本福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继承了社会运动研究的心理学传统，结合了社会运动研究的主观性、意义性和身份性认知的文化自觉，将社会运动研究拓展到文化的视角上来，从而使得社会运动研究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一) 社会运动中的理性主义

社会运动研究中这一视角的呈现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圈外人即非社会

^① 汉斯彼得·克里西、库普曼斯、简·威廉·杜温达克、马可·G. 朱格尼：《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38页。

运动研究者的贡献；二是圈内人即社会运动研究者的贡献。圈外人对于社会运动研究的理性化思考的贡献主要来自于曼瑟尔·奥尔森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思考“在一个理性人的情境下，集体行动何以可能”？曼瑟尔·奥尔森虽然考虑集团组织问题，但是他对于社会运动的集体行动同样也有有益的思考，毕竟社会运动也是一项多数人参与的集体行动的事业。理性人在关乎自身利益的分析中，更多考虑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样，在公共利益追求中，最好让别人付出更多，而自己坐享其成，即所谓的“搭便车”行为，但是事实上很多集团性集体行动的客观存在，使得曼瑟尔·奥尔森认为其中必然存在一些关键机制的作用。曼瑟尔·奥尔森认为是小集团现象以及选择性激励的结果，才可能使人摆脱理性人计算，使得集体行动成为可能。^① 理性个体采取集体行动方面的持续研究体现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过程中。通过实际考察，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治理存在一种自主合作性治理的制度演化逻辑，理性个人在公共池塘资源使用过程中，可能导致池塘资源的过度使用、拥挤或退化现象，因此在国家和市场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治理模式，即反复博弈之后的合作治理，以形成制度性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使得集体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行为得以持续。^②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所有对群体的解释必须通过个体方能得以理解。相应地，对人的理解必须借助对理性选择的目的性解释——指导行动的欲望与信念。换句话说，如果行动的采取是因为某些原因，那么，正是这些原因激发了这些行动。“利益”概念是这样的：如果 A 符合某人 P 的利益，那么 P 一定有能够采取 A 行动的理由。因为理性主义者关注跟随意图的集体过程与结果，或者个体理性行动的社会后果。这些后果经常是很不理性的：它们尽管是必然的，却是无意的、不想要的、不可避免的和出乎意料的。^③

曼瑟尔·奥尔森被社会运动研究所接受的过程是缓慢的，这是因为在

^①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2 页。

^②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73—286 页。

^③ 马克·利希巴赫、阿兰·朱克曼：《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22—323 页。

某种程度上，他专注于解释集体行动为什么不能发生，而且他似乎将集体行动的动机限于选择性激励的物质诱因；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及以后，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人代表他们自身之外的利益而罢工、游行、暴乱和示威呢？那可是一个喧嚣和热闹的抗争政治的十年；此外，曼瑟尔·奥尔森虽然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集体行动”，但关注更多的是在个人层次的动机和聚合上，理性选择如何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运动周期协调起来呢？社会运动研究者给予了理性的思考。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关于社会运动的发生更多表现为对运动群体的心理学解释，集中关注那些具有社会的怨苦和不满的群体、那些具有剥夺感的人对社会的报复和反抗，因而也被认为是病态的非理性的行为。一些同情社会运动的年轻的教授们（如欧柏萧尔、麦卡锡、扎尔德、蒂利和麦克亚当等人）以及一些曾经参与社会运动后又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如吉特林等人）对上述关于社会运动发生的解释给予了批判。正是通过对传统社会运动研究的批评以及对“奥尔森难题”的尝试性解答，运用理性思考社会运动的一批学者，形成了社会运动研究的资源动员理论，使得社会运动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突出表现为 1973 年安东尼·欧柏萧尔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著作的出版，以及麦卡锡和扎尔德在一篇以《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为题的文章中，他们试图对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出现的众多社会运动的原因做出解释。1977 年，麦卡锡和扎尔德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把他们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理论化。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这些文章数以千计地在各类文章和书籍中被反复引用。他们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①

首先，麦卡锡和扎尔德对社会心理学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不平等和压迫随处可见，如果剥夺感是导致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应该每天都可以看到反抗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反抗运动往往集中出现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传统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是非理性的，因而也是病态性的。而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研究者则开始质疑这样的观点，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参与社会运动是理性行为。在描述社会运

^① McCarthy, John D., and Meyer N.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1977; Oberschall, Anthony,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1973, pp. 102 - 160.

动参与者的动机时，研究者抛弃含怨恨或剥夺感等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眼，转而采用利益、兴趣等带有理性选择意愿的概念。欧柏萧尔写道：“正是那些造成一部分贫困和疾苦的制度，使得一部分人拥有自由和安全。自由、安全以及足够大的物质财富，不会轻易端到弱势群体前面。……既得利益者对变革坚韧不拔的抵制，使得社会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①言下之意，参与社会运动和抵制社会运动都是基于维护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同时，公民参与社会运动不是冲动的愤怒和不满的结果，而是手中可以动员的资源多了，那些运动企业家向经营企业一样地经营着运动产业，努力扩大有利于运动的个人资源扩张、专业化和外部财政支持，是专业化的运动组织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生。由麦卡锡和扎尔德发展而来的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社会运动不是某种形式的非理性或病态行为，不是个人疏离感或病态心理的表达，也不是隔离、拔根或离群行为的结果，而是根源于人生经历、社会支持和亲身生活环境的正常行为。^②

其次，资源动员理论关注使社会运动形成和成功的社会过程理性化，是对外部资源的有效性利用。相比大众社会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麦卡锡和扎尔德给予了政治和经济因素以更多的注意力，关注社会运动中的组织和领导。资源动员理论假定，不管人们感觉多么不安、愤怒和挣扎，如果没有组织和领导，他们不可能有效地发起社会运动，推动社会的变化。一个社会运动的新形式，即职业化的社会运动组织已经产生，领导者和主要的积极分子，是职业化的改革家，以追求改革事业为职业。改革家们在不同社会运动中走动，贡献他们的筹款技巧、公共公关、组织和领导能力，资金主要从第三方筹款得来，像教会、公司，甚至是政府。他们进行公关，向新闻媒体传播运动，通过电子邮件和通信接近潜在的支持者。欧柏萧尔认为，如果社会运动组织越是被组织、越是结构性的、越是正式的，它们越有可能完成它们的目标。任何一个社会运动组织必须是能成功地管理可利用资源的组织。这些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如工作、收入和捐款）

^① Oberschall, Anthony,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 Hall, pp. 33 - 34.

^② McCarthy, John D. , and Meyer N. Zald,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pp. 337 – 391, in M. N. Zald and J. D. MaCarthy,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Collected Essays*, New Brunswick, N. J. : Transaction Books, 1973; “The Enduring Vitality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in J. h. Turner.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2.

和非物质资源（如权威、道德贡献、信任、友谊、技巧等）。任何一个潜在的社会运动组织，最有效的资源必须被管理好，像劳动和金钱；一些工作必须做好，像运输、印刷、广播费用等。

再次，社会运动的发生是对社会群体的理性动员的结果。一个社会运动的成功和失败，必须依赖许多人怎么加入组织，他们是如何决定的，愿意做出什么样的牺牲以及他们对对手情况的了解程度等。使旁观者愿意加入，否则群体不会壮大；使支持者愿意奉献他们的金钱和时间，否则组织将用光资源；这些决定将对个人产生影响。理性动员使参与者感觉到他人正在为公共事业做出贡献，愿意加入进来做同样的奉献。这将涉及以下几个因素：组织和领导者、目标和鼓励动员的因素等。欧柏萧尔写道，社会运动组织为了实现它的目标必须成功处理三个主要的任务：第一是把“搭便车”者转化为运动的贡献者；第二是克服组织化的反对者；第三是实现组织的目标需要创造、获得管理维持组织和完成集体行动所必须的资源。^①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必须聚焦于动员的问题、不满的操纵、策略、社会基础设施等促使社会运动成功的必需品的选择。起初的工作已经在现存的组织中做了，现在主要是进行联合的事情。一个有效的领导者需要把每一个人聚合在运动里，创造共同的忠诚，领导者有时候必须迎合成员的需要。他们之间相互塑造，并相互控制。在社会运动的起始阶段，组织是非正式的，领导者必须和潜在的成员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活动，一旦运动进入正轨，就需要正式的组织结构。欧柏萧尔认为，现存处于分割状态的群体很容易被动员以形成社会运动。一个社会中群体越分割，动员加入社会运动组织的可能性就越大。成员是相似的，他们的欲望也是相似的。重要的是，这些群体能够被很容易动员起来，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联系网络，特别是动员资源，具有对现存成员的领导技巧和参与的传统。他们已经有了确定的领导者、成员、会议地点、行动路线、社会联系以及共享的信仰、符号和共同的语言等。

最后，参与社会运动的理性化。麦卡锡和扎尔德文章的关键逻辑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使美国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国家，这种社会转型给美国的社会运动发展带来的主要影响是人们手中的可自由

^① Oberschall, Anthony,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73, pp. 102 – 160.